

末世衙门的素描

晚清官场小说研究

刘春水 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末世衙门的素描:晚清官场小说研究/刘春水著. —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 2010.4

ISBN 978—7—81132—887—5

I. ①末... II. ①刘... III. ①古典小说—文学研究—中国—清后期 IV. ①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 第 068245 号

出版发行	江西高校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
邮 政 编 码	330046
总编室电话	(0791)8504319
销 售 电 话	(0791)8508191
网 址	www.juacp.com
印 刷	江西教育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西太元科技有限公司照排部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14.25
字 数	205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81132—887—5
定 价	25.6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引言	1
----------	---

第一章 官场题材小说成为晚清小说热点的原因	17
-----------------------------	----

社会层面的原因——政治黑暗和官场腐败是直接诱因、官场是人们宣泄失望和不满的直接对象、严酷的现实赋予小说批判现实和开启民智的责任

文学层面的原因——文学视野的拓宽、新小说理论的影响、小说是反映官场最适合的文体

作者层面的原因——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生活环境提供了条件、现实主义创作的需要

读者层面的原因——市民阶层的形成提供了读者群、官场题材抓住了读者的心理

第二章 晚清官场小说触及的社会文化问题	54
---------------------------	----

抨击封建专制政治——野蛮残暴、封建等级制度、特权制度、人身依附

鞭挞晚清吏治——买官卖官、政治投机、营私舞弊、人格扭曲、道德沦丧、自私麻木、无社会责任感

揭露经济弊端——小农经济观念、洋务和“新政”的弊病、经济乱象

否定封建专制文化——科举文化造就无用之材、专制主义扼杀新思想



目

录

第三章	晚清官场小说的文学特色考察·····	111
	取材特色——选取官场与洋场、官场与商场、官场与毒场、官场与妓场、官场与赌场、官场与文场作为主要场景,选取卖官者、搜刮者、伪清官、钦差贪官、“能吏”型贪官、恶清官、钻营者、糊涂官、穷京官、穷候补、“守财奴”型贪官、“恩将仇报”型贪官等作为主要塑造对象	
	艺术特色——结构独特、叙事创新	
	主要缺陷——工具化、政治说教、概念化	
第四章	晚清官场小说的文学史内涵及其评价·····	178
	晚清官场小说确立了一种新的小说门类因而具有重要的分类意义	
	深刻的思想文化内涵决定了晚清官场小说独特的文学史地位	
	当今社会转型期官场小说与晚清官场小说在本质上不同	
结语	·····	216
后记	·····	221



引

言



001

引
言

鸦片战争以后逐步发生发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上承中国古代文学,下启中国现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的许多作品像一面面镜子,从不同侧面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也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腐朽和没落,反映了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丑恶行径,反映了中华民族不甘屈辱的民众呼声,又从不同的层面描绘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新文化与封建旧文化的斗争过程,记录了中西文化相互碰撞和相互交流的历史轨迹。中国近代文学题材之广泛、内容之庞杂、读者反应之热烈、社会影响之深远,是以往的两千年古代文学不曾有过的。作为承前启后的中国近代文学,一方面是中国传统古典文学的承续和终结,另一方面又是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的先声,诚如有的学者所说:“古代文学中有的东西,近代文学中也有,不过有所变化;现代文学中有的东西,近代文学已经开始出现,不过尚未成熟,处于萌芽状态。”¹尤其在晚清时期,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封建社会的政治危机,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危机进一步显露。面对这一严酷现实,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思考、讨论、探索、寻找救国救民的途径。在文学领域,反映现实、针砭时弊、匡时救国的思想成为一部分忧国忧民的进步作家的基本主张,特别是在梁启超“小说界革命”和“政治小说”论的鼓吹下,以小说为工具、为武器揭露现实问题,开启民智,以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成为很多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作家的共同创作追



求。一时间,带有浓厚启蒙色彩的“政治小说”大量涌现。这类小说,除直接表达政治理想、宣传政治主张的如《新中国未来记》、《新中国》、《未来世界》、《新中国之伟人》等“政论性”作品外,更多的是一种通过暴露官场黑暗以批判社会、抨击时事为主要内容的现实政治题材作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官场小说”,本书为突出其“时代性”和“题材特点”,称其为“晚清官场小说”。这类小说以鲁迅所称的“四大谴责小说”为代表。

从题材上看,以四大谴责小说为主要代表的晚清官场小说基本素材全部取自官场,小说都是围绕官场生活、官场人物展开叙事,以暴露官场阴暗、黑暗、腐败、腐朽为主要内容,并藉此达到揭露时弊、反映现实、开启民智、服务社会的目的。为达此目的,一方面,除一些纯粹以市场利润为目的的粗制滥造的模仿之作外,以四大谴责小说为主要代表的绝大多数晚清官场小说,以整个晚清社会为背景,以晚清大大小小的政权机构——各地各级各类官府衙门为现场,以形形色色的大小官吏为焦点,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地描画了晚清朝廷摇摇欲坠、封建专制体制奄奄一息、国家民族处于屈辱地位的情况下官场的混乱与腐败以及官吏的堕落与无耻,表达了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对晚清政府的彻底失望、强烈不满和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深切忧虑,浸透着有识之士求新求变的迫切愿望和文明进步、国强民安的社会理想,蕴含着浓烈的民族、国家情感和文化反思意识。因此,作品的思想是厚重的,主题和基调是沉重的。这也是笔者对以四大谴责小说为主要代表的晚清官场小说在思想内容上的基本认识。另一方面,晚清官场小说适应宣泄强烈思想感情的需要,在表达方式上表现出了十分自由、随意和直露的风格。作家和作品脱胎于传统却毫不在意传统文学观念的束缚,大胆地嘲讽、大声地诅咒,写所欲写,无所顾忌;借取西方批判现实主义(或者写实主义)的方法却又毫不满足于对现实的冷静的剖析、透视,而是无拘无束地夸张和调侃,甚至常常穿插扭曲变形了的笑话、丑闻、类型人物等来把对晚清社会和官场的不屑、轻蔑发挥到极致。作品的总体风格很尖锐、很激烈,表现出明显的恣意和张扬。可以说,以四大谴责小说为代表的晚清官场小说就是这样一个特殊时代



主题和特殊表现方式的结合体,是内在的沉重与外在的恣意的按捺不住的书写。

四大谴责小说是当时描写和暴露官场黑暗的同类小说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基于此,本书把四大谴责小说置于“官场小说”的范围,并以其为主要对象来展开对“晚清官场小说”的研究。

一、谴责小说与官场小说的关系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将近代小说大体划分为三类:狭邪小说、侠义公案小说和谴责小说。长期以来,人们虽然没有明确地用官场小说来指称四大谴责小说,但人们对四大谴责小说的论述却非常清楚地表明了四大谴责小说与官场小说的内在同一性。据当代学者的看法,“鲁迅在近代小说研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谴责小说’……他所举例的《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至今仍视为晚清‘谴责小说’的代表作或称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²。而“所谓谴责小说就是暴露性的小说,在当时是大快人心的”³。暴露什么?官场腐败。正如有的论者所说,“晚清官场的黑暗腐败,是举世闻名的。关心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力主改良维新的作家,必然要把它作为自己口诛笔伐的首要对象。”⁴“清末的谴责小说广泛地描绘了当时政治和文化,尤其是描写了清代朝廷的黑暗,官场的混乱,官吏的贪赃枉法,迎合钻营,奸诈倾轧,崇洋媚外……表达对现实变革的强烈渴望,发泄心中对现实的不满和愤慨。”⁵“清代末期,是我国封建社会走向灭亡和崩溃的最后岁月,统治阶级也最为腐朽,最为黑暗。一大批进步的作家,用他们的笔将这种黑暗和腐朽尽情地暴露在世人面前,加以无情地谴责……把锐利的笔锋对准晚清官场,对准整个封建统治集团,从而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在我国文学史上不曾有过的,千奇百怪的、惟妙惟肖的晚清官场群丑图。”⁶“《官场现形记》以片断连缀为特色,暴露了上自军机大臣,下至州县杂佐的各色官吏贪财索贿,巧取豪夺,欺内媚外,投机钻营的无耻行径,惟妙惟肖地勾勒出一幅清末官场群丑图。《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则以九死一生为线索,纵笔于官场的‘豺狼虎豹’,商场的‘魑魅魍魉’,以及洋场的‘蛇虫鼠



蚁’之间,描画出一般贪赃枉法、腐化堕落、欺蒙诈骗、媚敌卖国的奇行怪状,成为清末社会积弊的一份见闻实录。而《老残游记》更以清新明净之笔,披露了清官之为政,苛刻与残酷尤甚于赃官的事实,由表面及实里,生面别开地揭示了清末吏治的腐败与黑暗。《孽海花》又用赛金花作主人公,纬以三十年新旧社会的历史,在宏大的格局中,细致真切地摹写出一班达官名士的风流丑态。”⁷ 以上种种论述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官场题材在晚清小说中十分盛行;二是很多论者早已自觉不自觉地吧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与官场小说联系起来了,有的实际上就是把它们当作同一概念。这里已经很明确地说明,以《官场现形记》为代表的“谴责小说”,就题材而言,就是官场小说。

有的论者指出,小说的作者、出版者和读者一开始就是把《官场现形记》等当做官场小说来看待的。“《官场现形记》并非旨在搜罗和联缀话柄以迎合时人嗜好,而是有自己的思想主题。李伯元在《世界繁华报》上发布《〈官场现形记〉初二编售书告白》说:‘中国官场魑魅魍魉靡所不有,实为世界五大污点。然数千年以来,从未有人为之发其奸而摘其覆者,有之,则自南亭此书始。……有欲研究官场真相者,无不家置一编……’”⁸ 这说明,以小说形式研究官场真相,是创作和阅读《官场现形记》等晚清官场小说的主要目的。

据阿英考察分析,官场小说数量居晚清各类题材小说之最。《官场现形记》开了风气,竟使得此后的小说,就题材而言,数量最多的“是暴露官僚的一类”⁹,“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六十回,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品。此外,又有冷泉亭长的《绘图后官场现形记》甲编八回(小说保存会版,1908)、天公《最近官场秘密史》前后编三十二回(新新小说社,1910)、心冷血热人《新官场现形记》一二集(改良小说社,1908)、延陵隐叟《特别新官场现形记》十二回(文明小说社,1909)、陆士谔《官场怪现状》初集十回(大声小说社,1911)、傀儡山人《官场笑话》二卷(改良小说社,1908)、天梦《官场离婚案》十二回(改良小说社,1910)、李韵《官场风流案》十三回(改良小说社,1908)、张春帆《宦海》四卷二十回(环球社,1909)、苏同《傀儡记》十六回、《无耻奴》十二回(自印,1908)、佚名《绿林变相》(改良小说社,1909)、《乌龟变相》(改



良小说社,1910)、陆士谔《六路财神》(改良小说社,1910)、黄小配《宦海升沉录》二十二回(香港实报馆,1909)、惠天啸依《宦海风波》(小说图画报,1907),不可考者尚多。”¹⁰显然,阿英这段话有这么几层意思,一是《官场现形记》带动了“官场题材”小说的创作;二是晚清时期“暴露官僚的一类”的小说在各种题材小说中数量最多,实际上自成一个大类;三是《官场现形记》是“暴露官僚的一类”的小说的代表作品。

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清末的《老残游记》、《官场现形记》等其实是一批以“谴责小说”命名的官场小说¹¹,“从发展历程看,官场小说缘起于清末谴责小说”。¹²这些是对谴责小说与官场小说关系的最根本概括,说明了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不仅与官场小说具有内在的同一性,而且是现代官场题材小说的发轫之作。

笔者大致认同上述说法,事实上,从《官场现形记》问世至今,几乎所有的研究者,在研究“四大谴责小说”时,都是围绕“官场”问题进行的,都是以对官场的分析和揭露来剖析晚清时期的中国社会现实政治和民众的生活情况,挖掘这些情况所透射出的深层次的传统的和新生的政治、思想及文化背景。除一些研究官场小说作者思想、生平 etc 个人资料的文章外,研究者每论及任何一部谴责小说,几乎没有离开官场另辟话题的,同样,绝大多数读者,也基本上是抱着了解晚清官场及形形色色的官场人物的心理去阅读谴责小说的。

在笔者看来,以四大谴责小说为主要代表的晚清官场小说一般都具有厚重的主题,这些主题的核心部分在于嘲弄和颠覆被中国人尊重信奉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体制、机构建制和价值观念,而且,大多数作品都有自己的侧重点,是作家深入思考和精心构思的结果。仅就四大谴责小说而论,它们在描写官场情状和表现官场主题上各有特色、各有侧重,《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侧重于写人、记事,主要通过故事描写官场人物的种种表现,对他们进行心理分析、人格揭示和灵魂透视,说明官场的丑恶、凶险,表达对官场的厌恶,进而全面揭露官场黑暗,为读者提供完整、丰富的官场生活画卷。两者的主题全面性、综合性较强。而《老残游记》和《孽海花》有所不同,两者的主题比较集中、单一。《老残游记》侧重于写“是与非”,主要是通过



对暴政和酷吏的揭露和批判,表明作者对惨无人道的官吏作风的强烈憎恨和坚决反对;《孽海花》侧重于写“有用与无用”,主要通过科举取仕的危害的描写,否定封建官吏的能力和價值。可见,晚清官场题材小说的立意主要包括以下三种:一是通过全面揭露官场黑暗、抨击官场人物来全面否定晚清政权的,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二是以批判暴政、酷吏为主题来表达善与恶的官场伦理观的,如《老残游记》;三是以否定科举取仕为内容来否定封建专制的官场价值观的,如《孽海花》。这三大立意构成晚清官场题材小说完整的创作思想基础和文学意义基础,体现了以“四大谴责小说”为代表的以暴露官场腐败、社会黑暗为内容的小说统称为“晚清官场小说”的文本依据、分类意义和理论研究价值,揭示了晚清官场题材小说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所包含的深刻思想文化内涵,显示了晚清官场题材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贡献和独特地位。

二、四大谴责小说研究概况的简要回顾

根据以上分析,长期以来没有专门的“晚清官场小说研究”这种提法,晚清时期“暴露官场的一类”小说一般被统称为谴责小说,而对谴责小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四大谴责小说研究,因此,笔者认为,此前对四大谴责小说的研究,可以理解为对晚清官场小说的研究。

四大谴责小说研究的阶段划分一直也包含在近代文学研究或晚清小说研究的阶段划分中,所以学界对近代文学或者晚清小说研究的阶段划分也是对谴责小说研究的阶段划分。当然,学界的分法不尽相同,如有的学者按“1949 年以前”、“1949 - 1976”、“1977 - 1986”、“1986 之后”¹³这种方法划分,有的学者按“开创期(1919 - 1949)、拓展期(1950 - 1979)、繁盛期(1980 - 2000)”¹⁴来划分,等等。本文主要借鉴“开创期(1919 - 1949)、拓展期(1950 - 1979)、繁盛期(1980 - 2000)”的分法并适当综合运用其他分法的一些观点和方法对四大谴责小说的研究概况进行简要回顾。

1949 年以前,四大谴责小说的研究是在资料的建设与方法的探索中展开、发展的。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阿英的《晚清小说史》等论



著中对谴责小说的论述是本阶段谴责小说研究的代表性和权威性成果。胡适为亚东图书馆出版的《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所写的序言,对作品的内容、艺术特点及作家生平,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对于作品艺术方面的评论,有较独到的见解。对作家的研究注重史实,并以采集到的第一手资料,对当时的一些讹传误议做了辨析,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¹⁵,促进了对四大谴责小说的深入研究。下面一段话,对1949年以前学术界对四大谴责小说的研究概况作了较为全面的实事求是的概括:“早在五四运动前,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等人,为了提倡白话文的需要,便对前现代的白话小说给予较高的评价。钱玄同谓白话小说《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孽海花》、《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为中国前现代小说中之有价值者。胡适则更认为,‘其足与世界第一流文学比较而无愧色者,独有白话小说(我佛山人、南亭亭长、洪都百炼生,三人而已)一项’。原因是‘此种小说皆不事摹仿古人……而惟实写今日社会情状,故能成真正文学’。”“五四运动后,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谴责小说产生的时代背景、思想内容及艺术上的长处与不足进行了客观的评价,并成为此后很长时间学术界评价‘谴责小说’的圭臬……阿英是研究近代文学的著名专家,他对谴责小说更全面客观的评价给后来的近代小说研究者诸多启示……30年代,陈子展、赵景深、杨世骥等人都曾关注谴责小说的研究……但其论述并没有超出鲁迅和胡适的评论。倒是有个别的研究者对谴责小说的评价提出了新见。王璜在《与〈儒林外史〉有连续性的三部小说(指《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孽海花》)》中充分肯定了近代谴责小说的讽刺艺术……瞿秋白以政治家的敏锐,看到了在近代谴责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新思想’,也看到了谴责小说才是那个曙光到来之前的黑暗时代所孕育的‘新的文学’。这无疑是一种卓识。它充分表明近代谴责小说的思想价值,以及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¹⁶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对四大谴责小说的研究是初步的、基础性的,虽然有些比较扎实,但总体上还较粗浅,如对作家的研究,多限于生平介绍;对作品的研究,一般内容的评介多于对作品思想、人物形象、艺术结构的研究;索引式的文章比较多,有时有

主观的穿凿附会。¹⁷

1950年至1979年,书籍方面有专门论述谴责小说的内容的主要是几部文学史和小说史,除游国恩等编的《中国文学史》外,其他还有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编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9月版)、《中国小说史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4月版)、复旦大学中文系1956级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稿》(中华书局1960年5月版)、吉林大学编的《中国文学史稿》(吉林人民出版社,1960年9月版)以及南开大学中文系编的《中国小说史简编·14》(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5月版)、十三所高校编的《中国文学史·第十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等,主要概括了谴责小说繁荣的原因、思想内容、艺术特点,这些概括总体上是准确的,特别是对谴责小说繁荣的原因概括得较全面。

本阶段对四大谴责小说的主要研究文章,收集在《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概论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7月版)和《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小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4月版)两本书中,其中专论谴责小说的文章主要有:《论晚清谴责小说的思想倾向》(章培恒)、《论晚清“谴责小说”中的揭露和谴责》(江东阳)、《关于评价晚清谴责小说的一些看法》(时萌)、《李伯元作品思想倾向初探——与章培恒同志商榷》(文乃山)、《李伯元作品的思想倾向是进步的》(海孺)、《关于李伯元作品评价的几个问题》(章培恒)、《〈官场现形记〉的谴责与揭露有进步意义》(李永先)、《〈官场现形记〉的写作和刊行问题》(魏绍昌)、《略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剑奇)、《〈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前言》(简夷之)、《怎样看待〈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王俊年)、《刘鹗及其〈老残游记〉》(劳洪)、《如何看待晚清的文学和政治——从新版〈孽海花〉(增订本)前言想起的》(穆欣)、《关于〈孽海花〉的评价问题》(葛杰)、《评〈孽海花〉的思想内容和社会作用》(徐梦湘),以及张毕来与刘维俊关于《老残游记》的评论文章、陈则光对《孽海花》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的评价等。上述文章反映了本阶段对晚清谴责小说研究的真实状况,是重要的文学研究史料。当然,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不足,就是对作品的艺



术性研究不够,“没有见到专文论述这个问题,即使有少数文章谈到这个问题,也只是笼统地、附带着说几句,大家都把注意力过多地用到作品的思想性的争论上去了”¹⁸。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四大谴责小说中有两部小说出版了研究资料集,即《孽海花资料》(魏绍昌编,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4月初版)和《老残游记资料》(魏绍昌编,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4月版),对后来谴责小说的研究有很大帮助。

总体而言,本阶段对四大谴责小说的研究呈现出四种不同情况:一是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对谴责小说虽有所批判,但总体上持客观的肯定态度。正如有论者评价说:“50与60年代之交所出版的几部《中国文学史》,一般对近代谴责小说的这几部代表作都有程度不同的批判……尽管当时出版的许多著作对谴责小说都有所批判,有的还相当严厉,但对谴责小说的总体评价还是持肯定态度的。它们都承认谴责小说揭露与批判了清王朝政治、军事的腐败,官场的黑暗,帝国主义的横行霸道,以及各级官吏灵魂的齷齪、道德的沦丧,客观上否定了封建制度,从而促进了人民的觉悟,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有一定程度的推进意义。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版的几部大学生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中国小说史稿》均持此态度。他们对谴责小说总的倾向作了如下评论:第一,近代谴责小说,多数‘以反帝反封建为主题,都带着比较强烈的救国救民的爱国热情,表现了作家赤心救国的愿望,在当时起过进步的作用。’……第二,谴责小说多是‘紧密地结合现实,有意识地为政治服务。’‘作者不仅通过作品来反映和暴露现实的黑暗,表达自己的爱憎,而且自觉地以小说为武器,作为政治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这是此前中国文学史上所未出现过的现象……而近代谴责小说大都把锋芒直接指向当代现实生活,对清王朝的腐败丑恶现象进行抨击。‘战斗性的强烈,也是过去所没有的’。第三,优秀的谴责小说作家大都采用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这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作家对现实的深恶痛绝的态度决定的……第四,对于谴责小说的艺术结构,作者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指出这种结构的形成有其社会原因,也受到《儒林外史》的影响,又是为了适应报刊杂志



发表的需要……”。¹⁹二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对谴责小说有过一次大争论、大批判,那场争论和批判是当时抓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产物,是极“左”思潮泛滥的结果,没有什么学术意义。三是从1967年到1978年底,特别是1967年到1974年,可以说是近代文学研究的空白期。“七八年的时间,学术研究完全处于停顿状态,没有一本或一篇真正研究近代文学的专著和论文出现”。²⁰当然,关于四大谴责小说的研究也不例外。四是“文革”结束后,四大谴责小说的研究开始恢复生机,《光明日报》1978年11月28日发表的时萌的《关于评价晚清谴责小说的一些看法》是其重要标志。“作者从打破僵化和简单化的思维模式入手,在文章中批评了过去研究界在评论谴责小说时的三种错误倾向:一是过分强调作家的‘身份家世和主观思想’,把作家的世界观等同于艺术创作,‘无视作家世界观本身的矛盾和变化’;二是指责‘谴责小说没有写出这些丑恶现象和社会制度的关系’,以及‘清除这些丑恶现象的正确途径’;三是有的研究者‘强调晚清谴责小说写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蓬勃发展的时代,因而断定其为历史前进的绊脚石’”。²¹这段话很清楚地说明了本阶段1978年以前研究界对晚清谴责小说的研究状况:研究中存在“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对前人过分“苛求”的弊病,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客观、冷静的尊重历史的科学态度,有些还人为地把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作品与现实政治需要对应起来考察,因而,难免模糊和曲解作品的原意,使得不少研究文章无法让人走进作家和作品所展现的真实境界。

在1980年至2000年这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的情况比较特别,这十年对四大谴责小说的研究主要是对作品的再认识和重新评价,对六七十年代研究中存在问题进行矫正,使对晚清谴责小说的研究回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辩证地对待文学作品的态度上来,回到学术研究的立场,以此提升学术研究的质量。此时,学术界对四大谴责小说的评价总体上“比‘文革’前要高得多,也不像‘文革’前那样分成观点截然相反的两派或几派,相互批评、指责……许多论者在谈到谴责小说的价值、意义时,往往捎带一些批评文革前贬低谴责小说价值、意义的内容,带有一种要重新认识谴责小说的味道”²²。人们也开始更多地



关注作品的艺术研究,“有人从艺术结构、形象刻画、叙事方式、心理描写方面勾画谴责小说艺术发展的轨迹;有人研究谴责小说艺术手法的新特点”²³,有的还开展了谴责小说与其他文学作品的比较研究,如陈方的《试论二十世纪初期我国小说中的丑病形象——兼及谴责小说及鲁迅小说的比较》、张化的《论西方文学对近代谴责小说的影响》(《江海学刊》1983年5期),当然,在给予四大谴责小说的思想性以更高评价的同时,多数人认为四大谴责小说的艺术性不高。

20世纪80年代(严格来说是1979年开始)对《老残游记》的重新评价是当时四大谴责小说研究中的一个突出现象。“从1979年黄德成的《〈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池太宁的《刘鹗是汉奸吗?》开始,至80年代中期,先后发表有关《老残游记》及其作者的文章100余篇,其中绝大多数是属于欣赏性的文字……”直到“1987年在刘鹗家乡召开了‘首届刘鹗及《老残游记》学术讨论会’……这次大会,彻底摘掉了刘鹗‘汉奸’的帽子,洗清了近百年的冤案……会议提交的论文,有不少陆续在报刊上发表,有代表性的文章有蔡铁膺的《寓言的暗示:〈老残游记〉与晚清社会思潮》、陈辽的《〈老残游记〉新论》、李士金的《〈老残游记〉深层的象征意蕴》、连燕堂的《‘养天下为己任’——〈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严薇青的《重视资料,深入研究——纪念刘鹗诞生130周年》、徐保卫的《〈老残游记〉一种现代化理论和一位思想者命运的检讨》、袁进的《创新与传统——略谈〈老残游记〉的魅力》、徐允明的《太谷学说的传道书——〈老残游记〉》等十多篇论文”²⁴。因为刘鹗的情况比较特殊,学界要为他摘掉“汉奸”的帽子,所以,相关为刘鹗“辩护”的文章较多。四大谴责小说中其他三部虽然没有这种特殊情况,但我们可以从人们对《老残游记》的重新认识和评价中了解当时总体的学术气候,尤其可以了解学界对谴责小说的基本态度,所以在此专门把当时《老残游记》的研究情况作为例子列举出来。

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吴趼人研究资料》(魏绍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4月版)、《李伯元研究资料》(魏绍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2月版)、《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刘德裕、朱禧、刘德平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版),为四大谴责小说研究奠定了



更为坚实的资料基础。

总之,20 世纪 80 年代对四大谴责小说研究的总的学术态势是边矫正 60、70 年代研究中存在的“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对前人过分“苛求”等问题,边着手开展对它们的更为客观的学术研究。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对四大谴责小说的研究进入了正常学术研究状态和个性化研究时期,朝着多元性、开放性、学术性的方向发展,研究者可以根据自己对作品的解读自由地表达学术见解。而且,近代文学研究队伍不断成熟壮大,一批专家学者成为新一代谴责小说研究骨干力量,一大批年轻人加入到了近代文学和谴责小说研究行列,使近代文学和谴责小说研究呈现较为活跃的局面。学术界对四大谴责小说的思想价值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挖掘;对作品的艺术价值的评价褒贬不一,不少论者从鲁迅对四大谴责小说的艺术缺陷的有关论述出发,简单地认为四大谴责小说艺术性不高,当然,也有研究者开始重视对作品的艺术价值进行挖掘,如对作品的语言特色、人物形象塑造艺术、结构艺术、叙事艺术等进行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这一阶段关于四大谴责小说的研究著述和文章虽然很多,但从论著看,大多是在研究近代文学时以其中的章、节的形式出现,主要是些总结、概括性论述,理论深刻性和个性特色受到一定限制;从论文看,有的是在论及近代文学时作为一个问题提及,有的虽是专门针对四大谴责小说来写,但基本上就单个作品的某个方面或单个话题进行评论,比较零碎,也难以深入。

四大谴责小说的研究情况大抵就是这样。就对以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为代表的晚清官场小说的研究而言,其主要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 20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中期和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至今两个时段。

以上是对中国内地多年来四大谴责小说研究概况的回顾。另外,台湾学者对四大谴责小说研究也比较重视,而且取得了不少成果,特别是林瑞明在 1980 年 6 月出版的《晚清谴责小说的历史意义》(台湾国立大学文学院),是一部以四大谴责小说为重点内容的晚清谴责小说研究专著。

综合各阶段研究资料可以看出,虽然一直以来人们对四大谴责小



说的研究很重视,几乎都把它作为近代文学研究的重点内容,特别是一些长期致力于近代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对四大谴责小说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但直至今日,四大谴责小说的研究总体上还是存在一些明显局限:一是系统性研究不够,研究成果比较分散、比较零碎;二是综合性深入研究不够,主要表现为较少把四大谴责小说及相关官场小说贯通起来研究,整体性、规模性不强,尤其是缺乏四大谴责小说研究专著;三是对以四大谴责小说为代表的晚清官场小说的分类整理不够,使晚清官场题材小说长期没有真正作为一个文学类型来对待;四是受某些成见的影响,对四大谴责小说及相关题材小说的艺术性研究、探讨不够,对作品的艺术价值认识不足,特别是对小说在人物形象刻画和塑造方面的特色、水平和成绩有所忽视。

三、本书的学术态度、写作方法和写作目的

从以上关于四大谴责小说的研究概况和局限的分析可知,学术界对于以四大谴责小说为代表的晚清官场小说的研究虽然是比较重视的,不少论者也常常以“官场”作为剖析和批判对象,但研究的格局和视野相对来说还比较狭小,即主要限于对单个作品或作者进行单方面研究,而以官场题材为切入点,从思想文化层面和文学史价值层面相结合的视角对以“四大谴责小说”为代表的晚清官场小说进行全景式的系统研究和深度观照的文章,几乎没有。尽管如此,本人认为,存在局限是正常现象,重要的是一代代学者在近代文学研究活动中,对以四大谴责小说为代表的晚清官场小说给予了重点关注,倾注了大量的心血,那些浸透着研究者们辛勤汗水和丰富智慧的文章和论著,为今后晚清官场题材小说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学习和参考资料。

理解历史、尊重历史、宽容历史,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毋庸讳言,由于受“左”倾思潮的影响,晚清官场小说研究中也或多或少、自觉不自觉地出现过历史性曲折,这种曲折主要表现为脱离小说所处的晚清真实历史语境,人为地给其贴上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标签,这当然是不合适的,但那毕竟是历史性的曲折,而且我们已经认识到了这种曲折,并回到了小说研究的真实历史语境中,因此,本书完全以尊